



新旧之变 从传统中国到当代国际政治

熊文驰 马 骏 主编

本辑要目

- 多重历史结构交错下的“朝贡体系”研究——一项学术思想史的考察／邹磊
- 近代华茶贸易衰败研究——基于定价权视角的分析／周洁
- 内外与夷夏——古代思想中的“中国”观念及其演变／曾亦
- 变化中的国家认同——读《中国寻求民族国家的认同》札记／姚大力
- 圣皮埃尔神父的永久和平计划纲要／卢梭
- 战争状态／卢梭



伦理与国际事务评论

第三辑

新旧之变

从传统中国到当代国际政治

熊文驰 马 骏 主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旧之变：从传统中国到当代国际政治/熊文驰,马骏主编
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伦理与国际事务评论;第3辑)
ISBN 978 - 7 - 208 - 12122 - 5

I . ①新… II . ①熊… ②马… III . ①国际政治关系-研究-
中国 IV . 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0906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装帧 杨钟玮

新旧之变：从传统中国到当代国际政治

熊文驰 马骏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6.5 插页 4 字数 274,000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2122-5/D · 2463

定价 38.00 元

Review of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伦理与国际事务评论
第三辑

本研究与出版得到以下项目资助，特此致谢

上海外国语大学政治学—上海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编号：2013GXYLXKZZXGG）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从‘霍布斯状态’到伦理型世界秩序构建”（项目编号：09YJCGJW009）

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二届“青年教师科研团队培育计划”

《伦理与国际事务评论》第三辑/2014年

Review of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2014

主办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伦理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画排序）

石 炳 南京大学
苏长和 复旦大学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
汪 宁 上海外国语大学
陈敏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武心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
胡礼忠 上海外国语大学
洪 涛 复旦大学
钱 翱 上海外国语大学
黄仁伟 上海外国语大学
戴启秀 上海外国语大学
罗森绍 美国卡内基伦理与国际事务委员会
(Rosenthal, Joel H. Carnegie Council for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潘格尔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Pangle, Thomas L.,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笔画排序）

马 骏 王联合 王 前 韦宗友 左 品 刘宏松 朱杰进 汤 蕃 陈金英
张绍铎 汪段泳 胡传荣 赵 裴 鲁茉莉 熊文驰 谭再文

目 录

专题 新旧之变：从传统中国到当代国际政治

多重历史结构交错下的“朝贡体系”研究

——一项学术思想史的考察 / 邹 磊 1

近代华茶贸易衰败研究

——基于定价权视角的分析 / 周 洁 39

内外与夷夏

——古代思想中的“中国”观念及其演变 / 曾 亦 67

变化中的国家认同

——读《中国寻求民族国家的认同》札记 / 姚大力 92

研究论文

民族主义及其政治正当性问题 / 熊文驰 133

制度变迁与地理政治秩序转型

——现代欧洲国际体系的起源 / 马 骏 155

经典译丛

圣皮埃尔神父的永久和平计划纲要 / 卢 梭 著 熊文驰 译 189

■ 新旧之变：从传统中国到当代国际政治

对永久和平计划的评判 / 卢 梭 著 熊文驰 译 211

战争状态 / 卢 梭 著 吴海荣 译 219

战争片论 / 卢 梭 著 吴海荣 译 228

思达读书会

《春秋》经世先王之志？

——《春秋》读法的旧题新解 / 邱立波 231

儒家王道与当代国际政治

——《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阅读与杂议 / 熊文驰 250

Contents

Special Topic: Between Old and New: from Traditional China to Moder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udy on the Tributary System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lacing Multiple Historical Structures: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History	By ZOU Lei	1
The Declining Chinese Tea Trade around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icing Power	By ZHOU Jie	39
Within or Without and <i>Yi</i> (夷) or <i>Xia</i> (夏): the concept of <i>Zhongguo</i> (中国) and its changing forms in traditional thoughts	By ZENG Yi	67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Changes: Reading on <i>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i>	By YAO Dali	92

Research

Nationalism and its Political Legitimacy	By XIONG Wenchi	133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al Order: The Origin of Modern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ystem	By MA Jun	155

Chines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Classics

Rousseau's "Abstract of Monsieur the Abbe de Saint-Pierre's Plan for Perpetual Peace"	By XIONG Wenchi	189
---	-----------------	-----

■ 新旧之变：从传统中国到当代国际政治

Rousseau's "Judgment of the Plan for Perpetual Peace"

By XIONG WENCHI 211

Rousseau's "the State of War"

By WU Hairong 219

Rousseau's "Fragments on War"

By WU Hairong 228

SIDA Reading Club

A New Argument to the Long Discussed Approach to *Chunqiu*

Book(《春秋》) By QIU Libo 231

Wangdao(王道) and Moder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view of

Back to Wangdao(王道): *Confucianism and the world order*

By XIONG WENCHI 250

多重历史结构交错下的“朝贡体系”研究^{*} ——一项学术思想史的考察

邹 磊^{**}

[内容提要] 今天东亚地区错综复杂的政治情势正以一种极其醒目的方式提示着,传统“朝贡体系”的政治遗产仍然深深嵌入在东亚的多重历史结构中,继续以某种形式发挥着影响。历史与现实的紧密勾连,也正是“朝贡体系”研究得以持续受到关注和不断被重新激活的根本原因。针对过去数十年中外学界所积累的丰富成果,首要的任务就是对既有的文献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梳理与评估。为此,本文将尽可能整合中国大陆与港台、日本、韩国以及美国学界的已有研究成果(尤其集中于国际关系与历史学两个领域),尝试性地从四个方面进行考察:(1)三重问题语境(中国革命、中国崛起与东亚复兴);(2)两个研究取向(求同与求异);(3)两个诠释维度(礼仪与贸易);(4)两个研究局限(重海洋轻陆地、重宏观轻个案)。

[关键词] 朝贡体系,问题语境,研究取向,诠释维度,研究局限

Abstract: Today's intricate political conditions in East Asia is an obvious reminder that, the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tributary system remains embedded in East Asia's multiple historical structure and continues its influence in a certain way. The inseparable connec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is the key reason why study on tributary system keeps catching attention and constantly being reactivated. With the abundant academic achievements accumulated by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in the past decades, the primary task for us is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review and evaluation on them. Therefore, this paper tries to integrate the existing research (especially focusing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y) from academic world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Japan, Korea and the U.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carry out the discussion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1) triple issue contexts, i.e. China's revolution, China's rise and East Asia's renaissance; (2) two research orientations, seeking the similarity or difference; (3) two interpretation dimensions, namely ritual and trade; (4) two research deficiencies, attaching too much more attention to sea than land, to macro-visional studies than case studies. Admittedly, this paper, as a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thoughts, is merely an elementary attempt at integration.

Key Words: Tributary System, Issue Context, Research Orientation, Interpretation Dimension, Research Deficiency

* 感谢徐师以骅、俞师沂喧、石源华、唐启华、权赫秀、潘忠岐、熊文驰、陈玉聃、张峰等师长以及同班同学杨紫翔博士以不同形式对本文的帮助。诚然,文责自负。

** 作者简介:上海市委党校发展研究院讲师。

一 引 言

自 2010 年以来，东亚地区的政治情势与安全环境急剧恶化，频繁的领土争端与军事对峙相互交织，使本已错综复杂的东亚各国关系持续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从黄海、东海到南海，从朝鲜半岛到泰柬边境，从钓鱼岛、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到黄岩岛，争议的地点几乎覆盖了中国自北向南的整个东部国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地域也正是传统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世界的主要范围，马克·曼考尔（Mark Mancall）曾称之为“东南新月带”，与之相对的，则是处于中国内陆边疆的“西北新月带”。^①实际上，“东南新月带”现况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是后冷战时代区域主要大国间力量消长的直接产物，也是战后政治安排与东亚冷战构造的部分延续。同时，它亦承载着传统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瓦解所带来的多重政治遗产。今天，几乎每个东亚国家都与其邻国存在着程度不一的边界纠纷，大抵也都肇源于这一深刻的体系性变迁与多重历史结构的交错。^②在此意义上说，19 世纪乃至 9 世纪的东亚历史依旧鲜活。今天东亚地区密集紧张的领土（海）争议与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也恰恰为我们反思近代西方国际公法、主权原则在东亚世界的历史性扩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现实基点。

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与东亚的复兴不仅催生了中外国际关系学界对于未来中国与国际体系、东亚秩序关系的政治想象，也激活了诸如“天下”、“东亚”、“东海”、“朝贡体系”、“帝国”、“文明国家”、“宾礼”、“从周边看中国”等文史学界同样关心的视域。这也使得国际关系与历史学界对于“朝贡体系”抑或

^① 马克·曼考尔：《清代朝贡制度新解》，载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6—68 页。

^② 日本学者马场公彦认为，东亚固有的历史性乃来源于三重霸权结构，即：前近代以中华帝国为中心而包含其周边地区的华夷秩序，近代由日本主导的殖民主义战争秩序，以及二战后美国霸权主导的冷战格局。参阅马场公彦：《后冷战时期“东亚”论述的视域——走向开放性区域主义的几个尝试》，石井刚译，《开放时代》2004 年第 3 期，第 72—88 页。韩国学者白永瑞也指出，若从韩国这一“双重的周边视角”出发，东亚国际秩序在历史上是由三个“帝国”（中华帝国、日本帝国、美帝国）所先后主导的。参阅白永瑞：《思想东亚：朝鲜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1—26 页。汪晖以琉球为切入点对东亚多重历史结构的透视尤具启发意义，参见汪晖：《琉球：战争记忆、社会运动与历史解释》，《开放时代》2009 年第 3 期，第 6—23 页。与琉球（冲绳）问题紧密相关的中日钓鱼岛争端，亦可在此思路中进行检视。

是“东亚国际关系”的研究，在历史知识的兴趣之外，具有了某种面向未来的现实意义。因此，无论是从现况中透视历史，还是在历史中观照未来，都将 19 世纪以及更早之前的历史与当下的处境紧密勾连。

在过去的漫长时间里，中外国际关系与历史学界围绕着“朝贡体系”这一主题已积累了数量颇为可观的研究成果。^①相较于日本、韩国、越南学者集中在东亚秩序的历史视域内理解“朝贡体系”不同，中国与西方学者的“朝贡体系”研究则往往在“天下”与“东亚”这两种思想框架之间游走。如何较为系统而恰当地梳理乃至评价这些不同时期的文献在问题意识、论述视角、思想资源上的异同与得失，从而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可能的启示，正是本文努力尝试解答的课题。^②为此，本文将尽可能地整合中国大陆与港台、日本、韩国以及美国学界的已有研究成果（尤其集中于国际关系与历史学两个领域），尝试性地从这样四个方面进行考察：（1）三重问题语境（中国革命、中国崛起与东亚复兴）；（2）两个研究取向（求同与求异）；（3）两个诠释维度（礼仪与贸易）；（4）两个研究局限（重海洋轻陆地、重宏观轻个案）。诚然，本文侧重于学术思想史式的归纳与诠释是初步的，亦是开放的。

二 “朝贡体系”研究的三重问题语境

1. 作为问题语境的“中国革命”

对于传统“朝贡体系”的现代学术研究，从最初的思想脉络而言，是伴随着近代中国的国族危机和东亚世界的秩序重组所开启的。这就决定了各种有关“朝贡体系”的讨论从一开始就是与特定的政治处境与思想框架相紧密勾连的。

例如，对于韩国、越南、泰国等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来说，从本国的视角来解构朝贡体系（堪称早期的“从周边看中国”），从而突破根深蒂固的“中国中心观”，往往是他们塑造本国主体地位与进行国族建构的出发点。因此，以近代西方主权平等的国际原则来批判朝贡体系中的宗属关系，乃至强调来自中国的“征服”和“侵略”，抑或是对带有屈辱性的朝贡关系避而不谈，往往是这些

^① 应当指出，“朝贡体系”这一概念并非描述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或东亚国际体系的妥帖术语。但考虑到该表述的流布深远，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将暂且采用之。

^② 已有的学术史梳理，参见权赫秀：《中国古代朝贡关系研究评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124—133 页。

论述的题中应有之义。^①再看西方的知识分子，则往往以文明世界的身份来批判朝贡体系中的“华夷秩序”以及中国对礼仪的“顽固”坚持，指出中国对自身以及世界认识的无知、虚妄与保守，从而确立一种后见之明式的中西文野对比。这种思维方式，往往被亡国阴影笼罩下的近代中国读书人所继承，甚至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在现代国家激烈竞逐的过程中，“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成为被中国、东亚各国、西方世界所集体批判的具有负面色彩的政治理念与结构，其共同的评判标准即在于东亚世界（或许日本是例外）在西方冲击面前整体性的节节败退。

若具体追究，这种批判在立论上往往是从政治上的宗属关系、经济上的贡赐关系和文化上的华夷秩序三个层面展开的，而每个层面都存在与其相对应的近代西方参照系。事实上，当政治平等、经济互惠、文化开放逐渐被确立为不证自明的原则后，建立在传统价值体系基础上的怀柔远人、厚往薄来、夷夏之辨已变得相当陌生和不可思议。更有甚者，以西方的标准来看，传统中国只有“朝贡—册封”而无“外交”，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政策”则散见于对王朝边界的控制与贸易、征伐、朝贡与册封的记载中。^②

因此，早期的“朝贡体系”研究是在近代中国外交何以失败、传统东亚秩序何以崩溃的问题意识下展开的。正如费正清在他 1941 年的《论清代的朝贡体系》这篇名文中开篇所指出的，“19 世纪中国的对外关系只有被置于传统中国的背景——朝贡体系中才能得以被理解。”^③此后，他更为直白地指出，“近代中国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难于适应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部分是由中国的世界秩序这个重要传统造成的。这种传统不只是历史趣谈，它还累及当今中国的政治思想。”^④费氏高足列文森也谈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⑤因此，按照费正清和列文森的逻

① 例如，韩国学者全海宗指出，“对韩国而言，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是带有屈辱性的。因而，向来韩国学者仅从经济或文化角度考察朝贡制度的原因亦在于此。”参见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1 页。

② John K. Fairbank,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47, No.3(April., 1969), p.449.

③ J.K. Fairbank and S.Y. 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6, No.2(Jun., 1941), p.135.

④ 费正清：《一种初步的设想》，载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 页。

⑤ 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4 页。

辑,晚清中国外交和东亚政治秩序的溃败,正是其自身历史传统无法应对现代化挑战而不得不承受的后果。可以说,“冲击—反应”、“传统—现代”的经典模式构成了费正清“朝贡体系”研究的思想框架,列文森的“从天下到国家”、“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不过是同一种意涵的不同表达。受到费正清和同在哈佛的杨联陞的巨大影响,余英时的研究则更为“自觉”而彻底地追本溯源。在1967年出版的《汉代贸易与扩张》一书中,他以贸易和扩张作为汉胡关系形成演变的中心主题,把对朝贡体系的研究推进到了汉代这一“中华帝国秩序基本模式的形成时期”。^①

若从更深层次上来说,尤其是对于西方学界以及海外华人学者(如杨联陞、余英时、邹谠、何炳棣、王赓武等)而言,这一问题又恰恰是与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关切紧密相连的。即,传统中国的内外政治秩序崩溃后,为什么最终导向的是红色中国的出现?^②革命后的中国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中国的思想遗产?^③在冷战的背景下,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又该如何理解共产党中国对外关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呢?^④因此,无论是出于对其原因的追溯,还是对其后果的预测,“中国革命”都构成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世界和海外华人学者对于“朝贡体系”研究的问题语境和思想背景。这也恰恰点出了“中国革命”在将晚清与冷战这两个时代相连接过程中的独特地位。

可以说,在“中国革命”的思想框架和冷战的特定背景下,西方世界和海外华人的“朝贡体系”研究显露出了超出学术兴趣之外的浓郁现实关怀。费正清曾经极富想象力地创造了“人民中央王国”(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的概念,用以描述传统的世界秩序观是如何以某种形式在社会主义中国得到了继承。^⑤这篇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前发表于《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的文章

^①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研究》,邬文玲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本书的英文版参阅 Yu Ying-shih,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Relatio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② 参见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③ Ping-ti Ho and Tang Tsou eds., *China’s Heritage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 (China in Crisis, Vol.1, Book Tw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④ Ping-ti Ho and Tang Tsou eds., *China’s Policies in Asia and America’s Alternatives (China in Crisis, Vol.1, Book O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⑤ John K. Fairbank, “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Foreign Affairs*, Vol.44, No.4 (Jul., 1966), pp.574—586.

无疑透露了清晰的政策意涵，即中国并不是另一个苏联，北京的行为逻辑并不完全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属性，美国的对华政策必须考虑到中国传统的影响。相应的，从传统朝贡体系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世界秩序观，尤其是中国对苏联、美国、东南亚的政策，就成了以费正清为核心的美国“中国通”们的常用方式。^①马克·曼考尔认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础建立在“我们”与“他们”的二分法上，在传统时代“他们”是以夷狄的形象出现，在冷战时代则是美国或苏联。^②在费正清和史华慈看来，传统的“中国中心”在“世界革命中心”的旗帜下得到了新的表达。^③

在这一时期，费正清等人对“朝贡体系”研究的最高成就，即 1968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论文集《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除费正清以外，作者还包括杨联陞、王赓武、马克·曼考尔、全海宗、铃木中正、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卫思韩（John E. Wills）、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等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巨大的顶尖学者。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后来诸多从事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各国学者，或多或少都与这个以费正清为核心的学术群体存在着一定的师承关系。从内容上看，该论文集全面梳理了传统中国与东南亚、朝鲜、琉球、越南、内亚、蒙古、中亚、荷兰的关系，奠定了对传统中国对外关系与东亚世界秩序的基本论述框架，成为“朝贡体系”研究迄今无法被逾越的典范性著作。因此，可以说，这部论文集是把握“朝贡体系”研究学术脉络的门径。

2. 作为问题语境的“中国崛起”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大陆的快速崛起，不仅重构了全球与地区层面的权

① Mark Mancall,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349,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Soviet Bloc(Sep., 1963), pp.14—26; Charles P.Fitzgerald, *The Chinese View of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John K.Fairbank,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47, No.3(April., 1969), pp.449—463; Albert Feuerwerker,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402, China in the World Today(July., 1972), pp.1—14; John Cranmer-Byng, “The Chinese View of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na Quarterly*(Jan.Mar., 1973), No.53, pp.67—79.

② Mark Mancall, *China at the Center: 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4).

③ John K.Fairbank,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461; 史华慈：《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过去与现在》，载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 300 页。

力结构,也深刻影响了中外学术的论述取向和研究议程。对西方世界而言,这是堪与“中国革命”相比的又一重要问题语境。例如,近年来,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股“唱盛中国”的潮流,其共同的倾向即在于为过去颇成定式的“中国落后论”翻案,关注范围几乎涵盖了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外交礼仪、行政管理等中国史的各个角度。^①这种学术转向无疑与中国崛起的大背景直接相关。何伟亚(James L. Hevia)对马嘎尔尼使华期间中英礼仪冲突的再阐释,即是对费正清“朝贡体系”经典模式的全面修正。^②尽管这部获得“列文森中国研究奖”的著作自问世之初即在中外引起了巨大争议,却仍然堪称继费正清之后西方学界对广义的“朝贡体系”主题所做最具创见性的研究。

对西方的国际关系学界来说,“尽管中国崛起是一种必然,但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将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何种角色仍然充满不确定性。”^③由此产生的问题意识包括:中国将如何处理与所谓“国际体系”的关系,是推翻、改造抑或融入?中国将如何处理与现有霸权国美国的关系,是适应或制衡,对抗或合作?当中国重回世界权力中心时,它将追求一种怎样的世界秩序?这种由“中国崛起”所导致的西方世界深刻的焦虑感,正可以与“中国革命”带来的冲击相提并论。尽管两种问题语境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今天西方学界对传统中国世界秩序日益浓烈的兴趣,和费正清一辈学人的问题意识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即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中国的世界观和行为逻辑?这种试图从中国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的思考方式,预设了当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延续性,以及中国与西方在战略思维上的差异性。江忆恩对所谓中国历史上“战略文化”的讨论,正是这种思路的具体反映。^④

就周边国家而言,对于历史上“朝贡体系”的选择性记忆,则将产生相当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现实认知。一方面,正如韩国学者白永瑞指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经济总量的急速增加,是让人联想到中华帝国复活的

^① 参见卢汉超:《中国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论西方汉学中的“唱盛中国”流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5—13页。

^② 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长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③ 郑永年:《中国国家间关系的构建:从“天下”到国际秩序》,《当代亚太》2009年第5期,第34页。

^④ Alastair I.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